

全球對話——國際社會學通訊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國際社會學會

主編的話

第二期的全球對話有一場關於「全球社會學」精彩的辯論：《風險社會》一書的作者Ulrich Beck從批評方法論的國族主義切入，認為全球社會學應該是一種批判的世界主義轉向，並認為，既有的全球社會學框架無法處理當代我們所面臨的全球化問題；另外，《南方理論》的作者、同時也是知名的女性主義學者Raewyn Connell則指出，Beck的世界主義社會學不過是另一種「北方觀點」罷了，因為Beck忽略了來自南方的多元聲音。而這期通訊，我們聽到了巴西、孟加拉、中國、吉爾吉斯、印尼、白俄羅斯、波蘭、德國等世界各地的聲音。這些聲音若是聽起來像是在振臂疾呼的話，那是因為社會學正處在民族國家與全球化的交叉路口上。未來四年我們將持續對話交流，特別聚焦於球化下的不平等與排除。這個關懷同時也是2014年世界大會的主題，而且，我也非常高興地在這裡跟各位報告：世界大會的籌畫委員會正式成立。最後，再次謝謝以下的譯者：August Bagà、Lola Busuttil、Gisela Redondo(Barcelona)、何經懋(台北)、Genevieve Head-Gordon(Berkeley)。投稿及意見請寄給主編：Burawoy@berkeley.edu。

本期內容

社會學的世界主義轉向	1
編織世界社會學？	1
歷史一隅	2
富士康：全球的掠奪者	3
達卡：絕望之城	3
社會學電子論壇	4
2014世界大會	4
論「LULISMO」	5
紀念Mattei Dogan	6
白俄羅斯：社會學遭到威脅！	7
會議	
印尼：全球遷徙	6
波蘭：社會怎麼了？	8
吉爾吉斯：突厥社會學	8
德國：跨國主義	10

親吻青蛙：社會學的世界主義轉向

Ulrich Beck, Ludwig-Maximilian University, Munich

Michael Burawoy的「面對全球社會學的挑戰」這篇文章 (Global Dialogue, Vol.1, No.1)相當激勵人心，但是，他卻沒有清楚說明：所謂的全球社會學只是一種新的觀點，用來補充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社會學，或者是一種革命性的觀點，一種批判性的轉向，可以用來取代既有的主流社會學？若是前者，我稱之為「全球社會學」；後者，我則稱之為「世界主義社會學」。當世界秩序瓦解的時候，通常就是社會學對於佔有支配地位之理論與研究進行反省的良機。可是，很令人驚訝的地，事實並非如此。主流的社會學理論仍然以一種優越且自信的姿態，籠罩在時代變動（氣候變遷、金融危機、民族國家）的上空。這種普世的社會理論，無論是結構主義、互動論、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系統理論，早就已經過時了，而且變得相當



現在讓我們親吻青蛙，看看青蛙會不會變成王子——開始重新對應這個全球化時代之中的新制度

(文接第2頁)

我們要如何編織世界社會學？

Raewyn Connell, University of Sydney

Ulrich Beck是一個具有豐富想像力與創造力的社會學家。從他的「風險社會」一書中對於歐洲的反思和社會動態的精彩分析，讓我們都獲益良多。在1990年代，他如同其他許多學者一樣，發現了全球化，並出版了「世界風險社會」和「何謂全球化」等書籍。現在，他進一步提供了一個新的社會學研究綱領：世界主

義社會學。

看到Beck從整個世界的層級來觀照社會，真是讓人非常開心。但是，他看到的是對的嗎？Beck提到了討論世界主義的都是歐美學者，卻沒有進一步討論為什麼會是這樣。

Beck說早期社會學的問題出在方法論的國族主義——即是在方法和理論中預設了社會的邊界

(文接第5頁)

(文接親吻青蛙：社會學的世界主義轉向)

狹隘。之所以過時，原因在於這些理論排除掉了那些可觀察的到的先驗存在：在現代性下社會與政治的基本轉型(從第一現代性到第二現代性)；之所以狹隘，是因為把西方的歷史軌跡和對於未來的期待(像是歐洲、北美、現代)錯誤地視為是必然絕對的，看不到任何可能的特殊性。

這是為什麼我們除了全球社會學，還需要社會學的批判性轉向。然而，社會或政治理論要如何可能在理論、經驗、方法、規範上，敞開視野去處理這種複雜且又質疑自身存在的現代性呢？又要如何解釋21世紀那些被資本與風險全球化所形塑的社會變動(包括未意圖後果、脆弱、易變)？什麼樣的理論或方法將會興起，而經驗上要怎麼去處理？我們又可以做些什麼？

首先，我們要對把行動者與社會科學研究者綁在一塊之關於社會與政治的強大信念—方法論國族主義，提出質疑。方法論國族主義把現代社會和以民族國家為疆界的社會劃上了等號。此外，我們還要追問：在21世紀，世界主義的視野對於社會人文學科來說，又意味著什麼？

1. 對於方法論國族主義的批判

簡單來說，方法論國族主義預設了國家、民族、社會是當代社會與政治的自然形貌。當行動者同意上述預設，我稱之為國族觀點；若是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接受了，我則稱之為方法論的國族主義。行動者與研究者之間對於上述觀點的差異是很重要的一點，因為它們之間有一種非邏輯的歷史連帶。而這種連帶則導致了方法論國族主義的許多規則。方法論國族主義不是表面的問題，也不是現代的錯誤。其包括了資料的收集與生產，社會、階級、家庭、國家、民主、國際關係等基本現代社會觀念的轉變。

再者，社會學者企圖把特殊的個案普遍化，然後據此普遍地宣稱社會如何形成(我的書Risk Society[1986] 也是)。美國的社會學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並認為所有的社會都和美國差不多(只是比較窮而已)。「去研究一個特殊的社會然後普遍化、推論所有其他的社會都是一樣的」這種觀點被廣為接受。這也讓他們去爭論何謂秩序和衝突的本質。換句話說，秩序與衝突在

美國社會中被檢驗，然後得到的所有理論都預設了其他社會(至少是那些富裕的工業社會)也是如此。社會學在過幾十年來就是這樣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在運作著。然後，全球化研究接著登場。

2. 如何去研究全球社會？這不是一個世界主義的年代，但是我們正朝此方向邁進。

我們可以區辨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字的三階段意涵：第一，拒絕；第二，精煉概念與經驗研究；第三，世界化(cosmopolitization)。第一階段已經結束了，因為第二階段的經驗研究和概念精鍊之後揭露了一種正在形成中的新社會圖像(例如Held等人著的Global Transformations)。全球化的支配性格包括了相互連結性(interconnectedness)，意味著全球人類的相互依賴。事實上，人們經驗的擴張，或多或少都被這無與倫比的相互連結性所影響(這不應該與世界系統理論或依賴理論相提並論)。

(文接第10頁)

歷史一隅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出版副會長

ISA的期刊歷史清楚的說明了ISA和社會學的發展脈動。1973年，第一期Current Sociology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處出版，這是我們那時唯一的一份刊物。每一期都包括了不同次領域的圖書目錄型文章，到了1990年之後才變為一般傳統型的文章。1984年International Sociology開始出版。它在傳統的形式下有著非常清楚的國際化任務。1999年增加了書評，並且也努力試圖要國際化，這部分後來成為了另外一卷次：IS Review of Books。同時，Current Sociology也增加了新的卷次：the CS Monograph，主要是具焦在研究委員會會議上發表過的研究領域為主。最後，2005年電子公告成立，它是非常具有原創性的平台。近來，它的創意和參與度的提升讓人相當吃驚。

誰做了這些編輯工作？性別比例可能並不符合大家的期待。女性編輯的比例從1970年的100%(Margret Archer，也是後來唯一的女性會長)減少到2000年的67%；國籍的比例也很有趣：1990年之前，百分之百都是英國人。然後加拿大、歐陸國家、以色列、新加坡開始加入，雖然英國仍還是多數。這之中很令人訝異的是竟然只有一位美國人：Said Arjomand；法國則是一位也沒有。以英語為母語的優勢顯而易見，而進來稍有些變化。最後一期的編輯(有來自巴西、印度、澳洲)呈現出國際性的成長。然而，語言和在地資源的問題也一直被提出來討論。

富士康——全球的掠奪者 Jenny Chan, University of London

台灣的富士康科技集團是全世界最大的電子代工廠，囊括了全球超過50%電子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營收。在亞洲、俄國、歐洲、美國等地，富士康也設立了超過40間的工廠和研發部門。2010年1月到9月的總營收達1.95兆台幣(608.2億美元)，將近是去年總營收的63%，甚至超越了一些富士康所代工的那些排名全球前500大企業品牌商(如微軟、Nokia)。隨著政府的龐大支出和對消費性電子產品需求的快速成長，中國的出口貿易很快地就從金融危機中恢復榮景。然而，中國的廉價工資和打壓勞工人權的政策，可能繼續維持下去嗎？是道德的嗎？在中國的富士康——世界電子產品工廠，今年初就有17位工人自殺。這樁悲劇導致了13人死亡、4人受傷。他們都是17到25歲的年輕民工。這些年輕生命的殞落，應該喚起中國和世人們對於發展主義模式的反省——反省我們為了經濟成長和高額利潤付出了多少代價，犧牲了多少人性尊嚴，以及失去了多少的生命。

富士康937,000名中國員工之中，有超過85%的人是已婚者和年輕人。1980和1990年之後出生的年輕一代對於生命有較高的期待。他們受過較高的教育，渴望跟上時代潮流，嚮往多元的大都市。然而，一旦對未來的期望越高，就越突顯出他們實際生活上的艱難和困苦。由於中國的農

村戶口制度，當年輕民工被最低工資和稀少福利的工作綁住時，他們其實有著很深的焦慮與不安。富士康的工人位於世界商品供給鏈的最底層，被剝奪了合理的工資和基本的社會安全。不論在富士康或其他工廠的中國工人，都仍然是位於社會邊緣的次等公民。

世界性的領導品牌商深深影響了與之合作的契約廠商。例如，Apple就壓榨世界各地供應商的利潤，並對於這些

(文接第7頁)



富士康工人

達卡：絕望之城 Habibul Haque Khondker, Zayed University, 執行委員

2008年，世界將近70億的人口之中，超過一半的人住在都市。這是歷史的里程碑。早在1800年，世界上只有3%的人口生活在都市；

1900年有14%；1950年則為30%。亞洲則是都市化的大本營，擁有許多人口超過百萬的大都市。2009年全球10大城市之中有5個在亞洲(東京、孟買、上海、加爾各達、德里，分別排名為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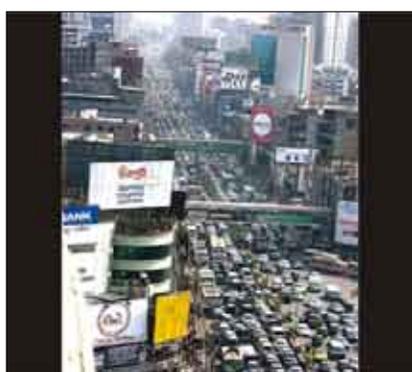
5、6、7、8)。事實上，前10大城市中有7個位於發展中國家。

做為全球第11大城市的達卡(Dahka)很有可能是其中成長最迅速的。1990年到2005年間，達卡的人口從600萬暴增為1200百萬。可以預測的是，2025年，前10大城市將會有8個位於亞洲，達卡也將成為第4大城，緊追在東京、孟買、德里之後。

從歷史上看來，都市化是工業化的結果。在發展中國家，都市化通常並沒有伴隨由勞工發起的工業化，甚至一點非正式的工作也沒有，那麼結果就是貧窮的集中。達卡1500萬人口中有28%的人住在貧民窟。這叫做「貧民窟化」，根本不是什麼都市化。達卡的貧民窟導致了非正式經濟部門的成長。大部分的貧民窟居民被整合進都市經濟之中：有些是人力車的車伕，另外，有大多數的女性則是做都市中產階級的家庭幫傭；達卡快速成立的工業部門也吸引了許多原本有工作的鄉村女性進入城市。而因為都市劃分並沒有徹底執行，整個就是住宅區和商業區隨便混合而成的大雜燴。其都市問題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讓街道亂成一團的交通問題，這也讓達卡成為世界上最沒有秩序的城市之一。

孟加拉在解決貧窮問題上已經有所斬獲，達卡的問題則是出在都市治理。因為它同時由中央政府的各個部門以及市政府同時管理，所以衍生出合作協調上相當複雜的問題。市長的屬於Awami League，但執政黨卻是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因此變成了政治問題。執政黨與在野黨在意識型態上有著很大的歧異，彼此在重要的國家議題上常常互別苗頭。

(文接第13頁)



大都市達卡

成立「社會學電子論壇」 Vineeta Sinh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執行委員



Vineeta Sinha

2005年我開始參與ISA的電子公告。這是由Susan McDaniel (後來的出版副會長)所發起的。是他當初邀請我申請成為總編輯的。ISA的這項創意深深吸引了我這位擔任過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編輯、來自新加坡大學社會系的社會學家。我認為這是一個令人雀躍的時刻，同時也想參與國際社會學界這個別具創意的新嘗試。

這份電子刊物原本是設計用來做為呈現來自全球社會學社群之作品、想法、意見的園地，主題包括實證、民族誌、人口學、理論、批判研究，並且在世界各地運作。某種程度上，電子公告從2005年設立以來，已經發揮了上述的功能。在發表過的議題之中會發現它呈現出全球社會學社群的多元性，而且處理過多層次且複雜的社會學問題。起初，它希望ISA的成員不但可以提出議題或想法，還可以參與學術辯論，但迄今這目標尚未達成。

在歷經5年、出版了16期之後，現在是一個適合的時機去將文章與其中包含的概念重新整合，反映出這個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巨大變動的世界。這份刊物需要繼續向前邁進，透過廣泛取用與宣傳，讓內容與形式更具可讀性。在開始階段，改變刊物名稱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它代表了新的認同與刊物的性質，因此，可能的選項是「社會學電子論壇」。它提供更多交換意見與互動的機會。

第二個基本的改變是這份刊物並不只是電子的(不使用紙本)，而且還是一份真正的數位化刊物。在這個時代，對於一個非紙本的刊物來說，網站、部落格、「Going Live!」就顯得相當重要。我非常樂觀的認為這將會有助於開啟討論、促成許多針對不同議題、立即且自願性的意見交流。在21世紀的前20年裡，新科技重新定義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因此，我們社會學家所做的、想的研究也將會改變現在的數位模式。

將這份刊物數位化的想法，一方面是對於科技與社會交集的確認，另一方面也是一種企圖理論化這一連串交集所做的努力。這項科技將使得我們能夠去呈現那些可以被看見、聽見的作品，像是影片、圖像、圖文、或是聲音等。

2005年我開始參與ISA的電子公告。這是由Susan McDaniel (後來的出版副會長)所發起的。是他當初邀請我申請成為總編輯的。ISA的這項創意深深吸引了我這位擔任過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編輯、來自新

Science編輯、來自新

在使的刊物內容更多元化、使得社會學家更能持續溝通交流的這點上，我認為這項創新非常有價值。如何實踐此一想法的對話和協商正在進行中，我也邀請每一位成員在社會學電子公告成立(go live)之後拜訪這個網站！■

2014年橫濱(Yokohama)世界大會的籌畫委員會

Raquel Sosa Elízag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Universidad, 計畫副會長

執行委員會已經核准同意成立了2014年橫濱世界大會的籌畫委員會。這經過了地區、性別、專業等多元的考量，也考慮到大會的名稱：「面對不平等的世界：全球社會學的挑戰」(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or Global Sociology)。我期待這次緊密且規模龐大的國際性合作會讓此次大會圓滿成功。

籌畫委員會主席：Raquel Sosa, 計畫副會長,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當然委員：

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會長

Margaret Abraham, Hofstra University, 研究副會長

Tina Uys,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國家學會副會長

籌畫委員：

J. Esteban Castro, Newcastle University

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執行委員

Koichi Hasegawa, Tohoku University, 橫濱世界大會在地委員會主席

Kalpana Kannabiran, Hyderabad University

Edgardo Lander, 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University of Coimbra.

Markus S. Schulz,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Benjamín Tejerina, 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 執行委員

Göran Therborn, Cambridge University

伊慶春, Academia Sinica, Taiwan, 執行委員

Elena Zdravomyslova, European University of St. Petersburg, 執行委員

(文接我們要如何編織世界社會學)

等同於國家的邊界。但是我們在Street Corner Society、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或是Ideology and Utopia等書中不太能輕易發現方法論國族主義。此外，Beck的史觀忽略了前兩代的歐美社會學家：從孔德和史賓賽，到恩格斯和Tönnies，再到涂爾幹、Ward、韋伯、Sumner。

19世紀的社會學已經全球化了。他們不把民族國家做為參照點，而是整個人類歷史。他們採用廣大的殖民地資料，而且，其社會進步論的觀點提供了我們理解帝國主義的擴張。

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是Beck不曾提及的兩個概念。就像許多其他全球化的學者一樣，Beck和世界體系或依賴理論保持一定的距離。他比較喜愛用無疆界的相互連結性一像是一滴墨水滲透到整張紙擴散開來一樣。論及平庸的世界化時，他給了一個在討論全球化時很常見的例子：在很多餐廳可以吃到各種料理，意即，有足夠的錢吃遍全世界。

但容許我問Beck一個社會學的問題：什麼樣的群體是不可能吃遍全世界的？他們可能是那數十億極度貧窮

的人；可能是鄉村居民；可能是不住在城市的人；也可能是那些因為要照顧老人或小孩而無法離開家去餐廳的女人；更可能是那些受工業無情壓榨勞動、疲憊萬分以致於無暇享受美食的男男女女；最後也可能是那些行動不便、病人、被污名化的族群或種族等所有被禁止進入餐廳用餐的人。總之，第二現代性的觀點反映了那些少數特權階級的經驗，然後把自己所看到的就等同於是這個世界新的真實現象。

(文接第12頁)

論「LULISMO」 Ruy Braga, University of Sao Paulo

Dilma Rousseff (勞工黨, Workers' Party)在10月31日的巴西總統大選中，以1200萬票的差距擊敗了Jose Serra (巴西社會民主黨, Brazilian Social Democracy Party)而勝選。儘管在最後一輪投票中出現了意外激烈的競爭，但是這樣的結果反映出了現今領導階層的政治霸權。

Dilma Rousseff獲得了多數東北部選民(67%)的支持。東北部是巴西最窮的地區之一，而這裡的居民也是因所得轉移計畫(Bolsa família)而受惠良多的一群。事實上，Dilma Rousseff的勝選代表了巴西歷史上一個新的政治與社會現象的鞏固：「Lulismo」。

政治學家Andre Singer為了理解這個新興的政治社會現象，比較了2002年與2006年的大選結果，發現所謂「Lulismo」現象的浮現是由於低收入選民(在總統Lula的計畫下他們可以獲得一或兩份最低工資的人)的支持所導致。同時，特別是在mensalão醜聞(違法支付國會議員每月零用金以交換其支持)爆發之後，巴西總統也流失了都市中產階級—那些曾經在2002年支持過他

的人—的選票。

到底何謂Lulismo？又它是從哪裡來的呢？90年代的巴西是正值企業生產的重建、私有化、戰鬥性工會面臨危機的時期，生產方式的改變和私有化導致了失業率的增加，也削弱了勞工組織的基礎。傳統福特主義的團結連帶感被不定期的就業模式所取代，所以戰鬥性工會團結連帶感就面臨了危機，並且使得工會變得更加官僚。

在Lula執政之後，工會的官僚主義更加明顯；但是，他們也保留了Cardoso經濟政策的本質。此外，Lula透過延攬工會幹部入閣而減少了社會運動的出現。靠著收編反對勢力和安撫被支配接級兩大策略，Lulismo讓1970與1980興起的社運消失了。之前不曾參與過選舉的Dilma Rousseff正是體現這個官僚霸權的例子。

現在我們可以定義何謂Lulismo了：一種選舉式(co-optative)革命，或稱為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所產生的霸

權，通常在資本主義半邊陲國家中發生。這些國家表面上宣稱會實踐社運的歷史訴求，然後實際上卻吸收社運幹部到國家機器中，企圖去反過頭來去削弱社運的反對力量。最後的結果就是社運也開始積極地為金融資本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剝削背書了。



Lulismo的傳承

巴西的底層階級也同意這樣的觀點(雖然較為被動了點)。他們完全陷入了對政府政策的的依賴網絡之中(例如Bolsa Família這項政策)、公立大學之族群平等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擴大、推動減少

(文接第12頁)

全球遷徙：來自峇里島(Bali)的觀點 Yoshimichi Sato, Tohoku University, 執行委員

10月29日，我在峇里島參加名為「Today's Trends of Global Migration in Japan and Indonesia」的國際會議。這是由我主持的社會階層與不平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所主辦的。演講者包括2位日本人和2位印尼人。日本講者談論跨國遷徙—特別是遷徙到日本；而印尼講者則討論印尼到峇里島的國內遷徙。雖然遷徙的動機不動，但是仍有相似之處：那就是全球化對遷徙的影響，以及遷徙對移民母國的影響。

很顯然地，全球化對讓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遷徙更加容易。但是，我們還不是很清楚國內的政策(像是移民審查)如何對影響了整個遷徙的圖像。例如，1990年起日本政府開放了巴西的日本裔的移民是為了要補充國內半技術和無技術工人的勞動力短缺。而多年後曾經是

體力勞動者巴西移民成為了中產階級，例如自營業者，便利用他們的族群資源或是中階管理的身份，作為巴西勞工和高層的日本管理階層的溝通橋樑。這樣的現象是出乎日本政府意料的，而且是一個全球化、遷徙、在地制度(或政策)之間如何互動的有趣議題。

會議中另一個有趣的議題是職業聲望。一位印尼講者提到峇里島的農夫雇用來自爪哇(Java)的移民而不雇用童工，因為儘管作農的收入較高，但是雇主想讓他們的小孩上大學。講者認為這是農夫職業的低聲望導致，這也是決定遷徙的因素之一。

最後，這次會議非常成功地彼此分享了日本和印尼的移民經驗，也讓我們對於全球化下的遷徙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紀念Mattei Dogan (1920-2010)

Arnaud Sales,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前研究副會長



Mattei Dogan

Mattei Dogan於2010年10月10日於巴黎過世。他是「Environment and Society」(1971-1986)，以及「Comparative Sociology」(1986-2006)之研究委員會的創始者兼會長。做為他同事與朋友的我們將會永遠懷念這位擁有堅強性格和寬大胸懷的學者。他在羅馬尼亞出生，大學就讀於Institut

d' 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接著在Sorbonne拿到History and Philosophy的碩士和博士(Doctorat d' État è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1953年他加入了位於巴黎的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而且CNRS後來也頒給他榮譽研究員的頭銜。從1973到1991他也擔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政治學教授；同時也在Tokyo、Yale、Firenze等大學客座。Mattei Dogan把實踐的熱情轉換為對於社會學或政治學之學術生涯的一部份，除了組織過許多會議和當過超過10種期刊的主編，他也在ISA或是ISPA創立且帶領了研究委員會。

Mattei Dogan同時也發表了200篇以上的著作，議題涵

蓋了經驗性、理論性、方法論、認識論等等的面向。大部分作都是關於政治與領導的菁英的研究，包括了：Mandarins of Western Europe (1975)、Pathways to Power (1988)、Elites, Crises and the Origins of Regimes (1998)、Elite Configurations at the Apex of Power (2003)。在政治行為與選舉研究的領域中，他也相當有名，特別是女性投票的模式和研究價值觀(民族主義、宗教、正當性)的社會學的意涵。他也不只有在巴黎從事研究，早年也在德國、義大利、英國、美國研究過。How to Compare Nations (1990) 這本書中發展出了一套政治社會學的比較方法；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他也分析學科分野、科際整合、社會科學中不同學門領域的混合等議題。請參考：Creative Marginality: Innovation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Social Sciences (1990) (with R. Pahre)。

2000年的時候Mattei Dogan成立了一個致力於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基金會。這也促成了後來ISA得以成立Fondation Mattei Dogan ISA Prize頒發獎項給傑出的社會學家。只可惜這個基金會被上一屆的執行委員會於2010年7月時給結束掉了。總之，這個基金會頒發了21個傑出獎項給社會學家，以及資助3個海外發行的論文集。

ISA非常感念Mattei Dogan曾擔任過「Environment and Society」之RC20和「Comparative Sociology」之RC24的領導工作，以及任何對於社會科學發展有益的成就。願他永遠安息。■

注意：威權政府正在威脅著社會學！

Elena Zdravomyslova, European University, St. Petersburg, 執行委員



Andrei Vardomatsky

科學史家指出社會學的發展和社會結構與政治體制密切相關。威權政體會限制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並且使得社會學一若這學科還存在的話一變成壓迫統治的傳送帶。如此一來，誰也不可能從事獨立的社會學研究，並且政府還會干預社會學家的立場，甚至威脅社會學家的生命！

以上所述的情境就是 Andrei Vardomatsky 的遭遇。他是

「Novak」研究室的負責人。他過去十幾年來 Novak 每個月都對白俄羅斯的公民進行民意調查，而且也是「Tell the truth!」這個公民組織的專家學者之一。這個組織的倡議目標是告訴大家白俄羅斯正面臨著什麼樣的社會問題：例如失業、車諾堡事件對大眾健康的危害等等。此外，他們甚至推薦其他的總統候選人。

2010年5月18日，Vardomatsky 博士的研究室被政府無預

警搜索；接著在月1日，這位社會學家在從立陶宛返回明斯克(Minsk, 白俄羅斯首都)的途中在邊境莫名其妙地遭到政府扣留。

依照許多評論者和 Vardomatsky 自己所言，這些舉動是威權政府對其專業研究和獨立媒體的警告，而且正好選戰正在進行中。總統大選將在12月舉行，現任的總統 Alexander Lukashenko 正準備操作讓自己連任3次一從1994年開始。而且依據憲法，他可以毫無限制地連任下去。所以政府正在對由公民組織、社會科學家、獨立媒體所組成的反對陣營進行政治干預。而且從2001年和2004年選舉時就發生過的例子來看，這已經是常態了。

白俄羅斯的獨立媒體廣泛地報導法律的強制搜索行動，但是公立的媒體卻噤若寒蟬。政府向來對專業的民意調查非常提防，選舉的時候特別如此。這也是為什麼今年大選期間政府會威脅這些社會學家和公民組織的原因。

國際的社會學社群對於 Vardomatsky 被政府侵擾的事件表達了高度的關切，並且聲明要捍衛社會學與學者的專業權利。政府對獨立運作的社會科學進行壓迫的舉動正彰顯了威權政府的脆弱與不堪。當社會學正在朝向無邊界的理想邁進時，研究資料的收集也將不受國家疆界的限制。白俄羅斯若沒有獨立的社會學，並且繼續保有蘇聯式對待專業學科的態度，其社會將永遠被宰制。被馴化的社會學毫無價值可言，而且也代表了這個社會也徹底被馴化了。這樣的社會，沒有言論自由，多元文化也不曾存在。 ■

(文接富士康——全球的掠奪者)

幫忙他們生產商品的人漠不關心。據估計，Apple 的 iPhone 四代機的毛利率為50%，相較之下，其他的競爭者則是20%-40%。Apple 自己享有了空前的利多，卻還是極盡所能壓低供應商的利潤。印度、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的製造商就相當不滿中國使得他們成為間接供應商、甚至被踢出供給鍊。但是，在承受來自壓低成本最嚴酷衝擊的人，始終還是那些在供給鍊最底端辛苦工作的勞工。因為來自於 Apple 和其他品牌廠的壓力，以2010年5月一當時發生了連續13起跳樓自殺事件(被中國媒體稱為「自殺潮」)一的時候為例，富士康深圳廠(員工數約50萬)的生產線工人的月薪只有900人民幣(132美元)。這樣僅能餬口的工資不但根本無法滿足勞工的需要，還要強迫他們每個月加班超過100個小時。這個數字是中國勞動法所規定之上限36小時的3倍。

富士康的總裁郭台銘公開聲明表示連環自殺事件與其公司內部的管理、工資、工作或宿舍環境毫無關連，而是

工人的個人問題所導致。近來媒體報導富士康在中國各地迅速擴廠，目標是在2011建立一個至少130萬的「製造帝國」。當這兩項因素結合在一起，不免令人擔心富士康將無法在員工自殺悲劇這件事情上有任何反省。在這段高度擴張的期間，富士康除了考慮如何提升其市場競爭力和股票價值之外，還會為他們的年輕員工做些什麼？

從今年五月到九月，「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組織」(SACOM)和由來自台灣、中國、香港超過60位教授與學生組成的「富士康調查小組」，在位於深圳、南京、昆明、杭州、天津、廊坊、太原、上海、烏海的12處富士康廠區進行研究，包括了1736份的問卷、300人的訪談。此外，還有14名研究員喬裝為工人進入工廠進行秘密調查。透過這項獨立調查，我們要求富士康面對並解決他們的勞動問題，因為任何人都沒有權力以他人的性命為手段去追求經濟成長或累積財富。

(文接第9頁)

全球化與突厥世界

Tina Uys,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國家學會副會長

有件令人非常令人興奮地(也有些不安)的事：我踏上了一趟29小時、從南非到吉爾吉斯(Kyrgyzstan)的Bishkek的旅程：參加突厥社會學大會(9月21-24日)。因為我看到報導上說在吉爾吉斯南部有烏茲別克族(Uzbek)和柯爾克孜族(Kyrgyz)的族群暴力衝突，而且我還沒有拿到簽證——只有一封來自大會的信，告訴我簽證正在瑪納斯(Manas)國際機場等著我。不過，當我抵達機場的那一刻，一切的不安就煙消雲散了。大會非常盡力地確保每一位參與代表能順利參與會議，我感到相當安全，並且盡情享受在那裡參加會議的每一刻。

大會由在Kyrgyz-Turkish Manas University的突厥文明研究中心(Center for Turkic Civilization Studies)所舉辦。大會委員會的秘書長是來自該校社會系系主任的Ilhan Sahin和吉爾吉



在吉爾吉斯的山上踏青的社會學家

斯社會學會(Kyrgyz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KSA)的會長Kusein Isaev。KSA是ISA最年輕的國家會員，也是僅僅4個來自突厥地區的國家會員之一。另外3個分別是亞塞拜然(Azerbaij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哈薩克(Kazakhst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土耳其(Turkish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以下的國家分別代表參與出席這次大會：吉爾吉斯(Kyrgyzstan)，哈薩克(Kazakhstan)，土耳其(Turkey)，俄羅斯(Russia)，亞塞拜然(Azerbaijan)，庫德斯坦(Kurdistan)，塔吉克(Tajikistan)，韃靼斯(Tatarstan)，烏克蘭(Ukraine)，烏茲別克(Uzbekistan)。

大會以非常優美的音樂、與傳統舞蹈、Manas英雄史詩的表演來開幕。後者包括了以Manas為主之神話故事的總和。在開幕場次，我非常幸運地有機會鼓勵在場的200多位參與者能夠參加ISA。而且我也在註冊桌上放置了介紹ISA的小冊子。

大會主題是「全球化與突厥世界」。有200篇論文3天內分別在40個不同的場次發表。討論相當生動，也顯示出這個地區的社會學非常強韌有生命力。我也很欣慰地看到許多年輕社會學者將這個學科當作他們未來的志業。

我想，阻礙像我這樣來自ISA的參與者盡情投入這個大會的，無非就是語言問題。這次會議的主要語言是土耳其語(Turkish)和俄羅斯語(Russian)，另外加上柯爾克孜語(Kyrgyz)和哈薩克語(Russian)。吉爾吉斯的官方語言是柯爾克孜語(最近才被列為官方語言)和俄羅斯語(除了邊境少數人之外幾乎所有人都瞭解)。可惜的是，上述的4種語

言，我完全不懂，而我必須藉助一位非常傑出的翻譯：Meerim Kinalieva才可以和其他人溝通。她的幫助真是難以形容的珍貴。來自American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http://www.auca.kg/>)的Galina Gorborkova邀請我和Nikita Pokrovsky (ISA執行委員)去對該校的社會系畢業生的研究計畫進行討論。他們的熱情和對英文的掌握度

讓我印象深刻。我想這可以看出吉爾吉斯社會學的未來將無可限量。

另外也值得一提的是，Kusein Isaev教授邀請Nikita和我到一位會員的家中作客。這讓我不但見識到了吉爾吉斯人的好客，也瞭解了一部份他們的家庭生活。我非常榮幸可以與他們分享家庭聚會的喜悅，而且發現他們家庭成員是如此緊密的彼此聯繫著。

最後，我要謝謝Kyrgyz-Turkish Manas University的突厥文明研究中心邀請我參與此次大會，特別是招待我的Isaev教授和Sahin教授，以及Meerim Kinalieva的翻譯，他們讓我感到賓至如歸。我期待ISA和突厥社會學家們可以有更緊密的互動。Kyrgyz-Turkish Manas University的管理階層和其他國家代表的接觸，也讓我們發現他們非常有意願展開任何形式的合作。■

社會怎麼了？—來自波蘭的歷史觀點

Grażyna Skapska,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Kraków

2010年9月，波蘭社會學會(Polskie Towarzystwo Socjologiczne, PTS)和Jagiellonian大學共同舉辦了第14屆全國大會。來自世界各地和波蘭國內共計1200多名的學者前來共襄盛舉，相當成功。更重要的是，有3分之1的與



PTS大會開幕演講，Kraków

會者是學生。這次大會包括了3個全體會員會議、4個座談會、85個一般場次、以及數個特別場次和看板論文。開幕演講者是Claus Offe，閉幕演講者則是Michael Burawoy。Burawoy更和年輕的社會學家討論社會學及社會學家在當代與ISA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次大會主題代表了波蘭社會學的傳統—特別是專業社群的傳統，展現了

學者積極參與批判性的社會議題辯論，同時也表現出了他們對理論的高度興趣。

PTS是波蘭最主要的學會，它的歷史從1956年開始，但最早可追溯回1927年時Florian Znaniecki所創立的Polish Sociological Institute。1931年在Poznań舉辦了第一屆全國大會，同時也依照Znaniecki的提議正式改名成為波蘭社會學會。這種形式的組織在歐洲是首例。

不幸地在戰後史達林(Stalin)統治期間，社會學在1951年之後開始被貼上資產階級(bourgeois)的標籤，所有社會學系所和機構被迫關閉。直到1956年，社會學才重回學界，原因是Universities of Warsaw和Universities of Łódź和Stanisław Ossowski為主的社會學家在波蘭哲學會(Polish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下設立了社會學小組，而波蘭哲學會是世界社會學會的會員，同時Ossowski教授是ISA的創始者之一。隔年，這個小組「自動轉型」成

為波蘭社會學會，Ossowski被推舉為會長。在共產統治期間，雖然學術界仍受政府的意識型態控制與把持，但是社會學保有了相當程度的自主性，提供了批判性的和自由言論的空間。過去的會長包括了上述提及的Stanisław Ossowski之外，還有Nina Assodobraj (1964-1968)，Władysław Markiewicz (1968-1972)，Jerzy Szacki (1972-1976)，Stefan Nowak (1976-1983)，Janusz Ziólkowski (1983-1989)，Antonina Kłoskowska (1989-1994)，Antoni Sułek (1994-1998)，Andrzej Kojder (1998-2002)，Włodzimierz Wesolowski (2002-2005)，Piotr Gliński (2005-present)。現在的會員將近有1200人，榮譽會員包括了James S. Coleman，不久前才剛剛過世的Shmuel Eisenstadt, Theodore Abel, Stanisław Andreski, Zbigniew Pełczyński, Jerzy Zubrzycki, Melvin Kohn, Jiri Musil, Richard Grathoff, Jan Sedlacek, Feliks Gross, Vladimir Yadov。PTS也定期出版英語期刊：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文接第13頁)

(文接富士康——全球的掠奪者)

今年中秋節，我們拜訪了17歲的田玉——一位自殺的生還者。3月17日，這位無憂無慮、長展笑顏的女孩從深圳龍華廠的員工宿舍4樓一躍而下。和其他自殺者比起來，她或許幸運許多，因為她還活著；然而，她也是不幸的，因為在經過多次的手術治療之後，她仍然半身癱瘓，必須坐在輪椅上度過餘生了。

為了保護自殺工人免於遭受到不公的對待，我們極力要求富士康及其顧客改善勞動條件。我們同時也鼓勵可

信賴的NGO或學者在工作環境提供勞工權利的參與訓練。工人應該透過民主組織或集體議價的方式去行使其權利。在寫作期間，富士康壓制了位於印度Tamil Nadu廠由7800位工人發起的和平靜坐罷工。富士康在印度的管理階層拒絕和工會代表協商調漲工資。現在一位4年年資的工人每月只有4800盧比(106美元)。10月9日，印度警方逮捕了上百名靜坐罷工者，並將他們關進了Vellore Central監獄。

立即行動！(1)請支持名為「India:

Over 500 Workers Jailed in Dispute with Foxconn」的LabourStart運動(http://www.labourstart.org/cgi-bin/solidarityforever/show_campaign.cgi?c=790)；(2)參與「Create Humane Labor Standards at Foxconn and End 'Stealth Manufacturing'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學生與學者連署(<http://sacom.hk/archives/649>)。請跟SACOM的Debby Chan (debby@sacom.hk)或是Jenny Chan (wchan@sacom.hk)聯絡。謝謝！ ■

質問跨國主義：德國社會學會成立100週年

Petra Rostock, Linda Supik,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Main

德國社會學會(DGS)於10/11-10/15日在法蘭克福(Frankfurt/Main)舉行了百年慶祝大會(Centennial Jubilee Congress), 主題是「Transnational Makings of Societies」。
(<http://dgs2010.de/English>)

百年之前, 民族國家是新的行動者, 而且, 「以民族國家為疆界的社會」(national society)是當時仍在形成中的新學科—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現在的任務則是提出社會(the social)的新視野: 跨國社會(the transnational space)。「它是個適切的概念嗎?」「如何概念化?」「如何測量及研究?」以及眾多與會者都問的問題: 「它會取代民族國家而成為新的研究焦點嗎?」當一個國家的(national)社會學組織一直被質疑其研究對象和領域而倍感威脅, 或許是件在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吧。

跨國主義這個概念在法蘭克福就像是行話一般。雖然它早就輕易的就被整合進其他的場次的討論之中, 但是卻從來沒有成為主題。有時, 「跨國的」這個概念以廣義的姿態被呈現, 不具特殊性, 也因此常與「國際的」(international)混淆。

過去一百年來德國的社會學是如何變遷的呢? 當然, 男性中心的偏見仍顯而易見。一百年來, 德國社會學會只有一位女性會長。不過, 學術社群中的性別比例近年來有比較平衡一些。至於「跨國性」(transnationality)呢? 發表人名單中有呈現出來嗎? 邀請「來賓國家」與會向來是大會傳統, 而且皆是邀請法國與美國—另外兩個大社會—的知名學者。

在文化相當多元的法蘭克福, 因為當地有相當多的學生參與大會, 因此參與者的臉孔皆非常的「白」。白人優勢仍然很普遍, 即使是在最進步、最受歡迎的場次: 「以後殖民女性主義觀點論跨國主義」裡也一樣隨處可見。雖說是最進步的, 但是, 這些人所使用的概念仍然相當表面, 而且與後殖民女性主義的基本規範預設有所抵觸。我所謂的基本規範, 指的是去將社會批判與知識論結合起來去挑

(文接社會學的世界主義轉向)

第三階段揭開了這全球相互連結性最核心、最隱微、最不必要的結果: 實際存在的世界化—全球他者(global other)的結束。這正是重點: 去區辨哲學上的世界主義和社會科學的世界化。

從康德哲學的角度而言, 世界主義意味著某種主動的事物, 既是一種是任務, 也是一種有意識的行動, 更是一種自願的選擇; 很顯然地這是菁英的工作, 也是一種由上而下的觀點。它則揭露了隱微且讓人不安的一件事實: 它在民族國家、法律、商標的表面下相當有力, 而且敵對性

戰真理霸權, 並去強調既有的霸權是如何地奠基在排除、同質化、他者性(alterity)之上的。

面對德國持續在辯論族群整合、伊斯蘭, 以及被污名化的那些移工、因為文化差異而被歸類為天生的劣等族群, 我們對於最後這場名為「文化全球化: 跨國宗教社



Hansfried Kellner, Thomas Luckmann, Peter Berger (David Schommer攝)

會的新型態」的討論相當失望。這個場次分別代表了三位知名的學者(Peter L. Berger、Hansfried Kellner、Thomas Luckmann), 不過對於現狀的分析以及對於國家社會未來的觀點則是付諸闕如。

相對的, 大會團隊將當代社會問題與劇院和音樂的發展做了非常好的連結。不過議程安排對於與會者來說太過於不近人情。沒有任何的休息時間。主辦者似乎認為與會的學者從來就只有和知識、空氣為伍。

我們都能理解對於過去反思的重要性, 特別是在這個百年慶祝大會上, 我們更希望舊的和新的概念在未來會持續被挑戰, 特別是「national」這個概念。此次大會清楚告訴了我們一件事: 關於「national」是否適合成為社會學的分析單位的討論, 仍然缺席。■

很強; 它正如同持續揮舞民族主義旗幟, 以及民族認同持續地被強調一樣, 從社會由上而下地延伸到家庭、工作場所、個人等的日常生活面向。平庸的世界化為何? 舉例而言, 我們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獲得大量的食物, 而且我們可能都擁有足夠的金錢去品嚐各地美食。有些人認為這是後現代折衷主義, 在我看來這不是反對現代性, 而是一種對何謂現代性進行反身性思考的新嘗試。所以, 烹調、全球性的風險、藝術、全球文化衝突(例如丹麥的穆罕默德卡通事件)已經從世界上各個國家的多元性中被重新組合、比較、與並列。

(文接第11頁)

(文接社會學的世界主義轉向)

火山爆發型的社會地景、激化的社會不平等必須重新被對應到鉅觀和微觀的層次上，以及透過溝通、互動、工作、經濟、以及各種社會與政治的實作，水平地投射出去。Chang Kyung-Sup曾經說過：就像氣候變遷一樣，主流的社會經濟轉型模式並不適用於某些特定的國家。試想：全球自由

“但是，今日所謂的世界主義，是一種平庸、強制、混雜的世界化，..... ”

貿易與金融、超越國家疆界的企業組織和跨國的生產製造、全球化的勞動、全球化的競爭與階級衝突、全球化的政策與管制(強勢的IMF等)、網路溝通和網際空間、生命形式透過生物科技被巧妙的操作與安排、各種形式的風險(恐怖主義、金融危機、AIDS、SARS、新流感等)、跨國人口的重新組成(移工、配偶或小孩的遷徙)、全球性的藝術與娛樂，以及全球性資助和控制的區域戰爭。沒有一個永久的系統階層、序列或選擇性——不論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或是在不同的族群、宗教、區域裡面，可以免於面對上述這些新的文明化力量。不管人們喜歡與否，這些都是每一個國家及每一個人所關心的事物，因為，這些事物與新的文明化過程結構性的交織在一起。我稱此一文明化過程為「反身的世界化」(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而這個全球性文明化的情境，是一種反身現代性，或是第二現代性。

近期的世界史似乎正在要求著大家：若要在這個新文明化的潮流下生存——邊論想要從中得到任何好處，就需要每個國家主動積極地去內化這

個過程。這裡，社會學的意涵是相當清楚的：全球的他者就在我們之中！孤立式的努力——無論是貿易保護主義、宗教基本教義派、民族基本教義派、媒體或網路控管——都會遭受到國際的道德譴責(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無效的)。事實上，接受或拒絕這股力量仍然超乎任何有意圖之社會或政治的選擇之外，因為，這股力量具有全球反身性一意即，這是一種強迫，也是一種世界性的命令：合作，否則等著失敗！

3. 世界主義觀點的社會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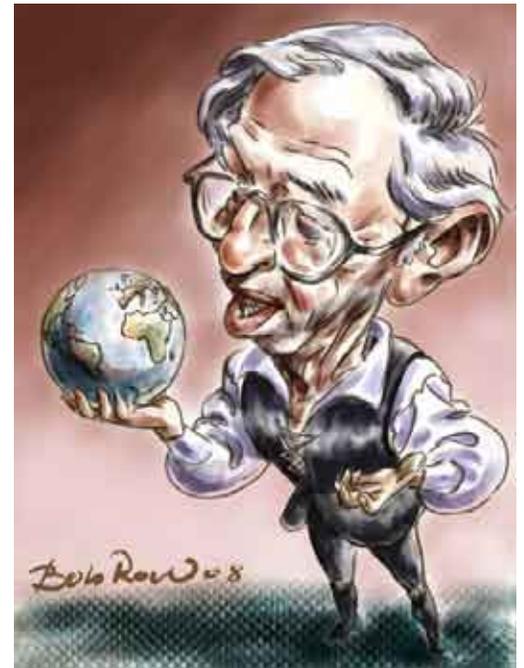
在爭論世界主義和世界化的人都是歐美學者，這是相當矛盾的一件事。這兩個概念主要在處理我們身處的這個相互連結的世界，以及其中的全球化、風險、權利、責任等議題。但是，這兩個概念也反映出了現代世界系統中古老的核心觀點，也是以下四項偏見的源頭。

第一，雖然努力把貧窮、發展或是新興經濟型態納入考慮，但是它是一種富人的觀點。第二，即使世界主義理論想要變得更多元化，可是它卻根植於西方。第三，世界主義理論為了避免文化偏見，所以自己用想像的從文化差異進入到普同世界(旅行到異文化之地而彷彿自己身上完全不具有之前的文化，提供新的全球化路線的同時卻彷彿沒有改變任何既有的文化脈絡)。第四，如同Craig Calhoun曾經指出的，儘管世界主義關心社會問題，但是由於它就處於世界體系的核心位置，所以想像出了一個比真實世界更系統化、更整齊地被連結的世界。以上這些是世界主義社會學必須克服的問題。

讓我用以下七個論點來總結何謂社

會學的世界主義轉向：

1. 早期的現代性階段是被民族國家所形塑的。雖然市場或其他領域越過了民族國家的邊界，但它會去管理人們要面對的風險。
2. 現代社會與政治理論從民族國家的支配環境中發展而來，並將民族國家內化為一個理想社會的模型。這個社



會被民族國家的真實權力和普遍的期待(期待民族國家來組織這個世界)所影響。

3. 早期的哲學世界主義從以下的脈絡發展而來：要求各個族群的人們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彷彿這些人所處的社會情境從來不存在。
4. 要去正視全球自由貿易與金融、超越國家疆界的企業組織和跨國的生產製造、全球化的勞動、全球化的競爭與階級衝突、全球化的政策與管制(強勢的IMF等)、網路溝通和網際空間、生命形式透過生物科技被巧妙的操作與安排、以及全球性資助和控制的區域戰爭。

(文接第13頁)

（文接我們要如何編織世界社會學）

Beck的世界主義模型從全球化理論發展而來，參照的都是歐美學者的研究，然後投影放大到整個世界。這個觀念源自於北方的知識份子，用北方的經驗，也來自於北方特權階級的經驗。民族國家的消逝，反身性，多元性、相互連結性、全球恐怖主義、全球化他者——我們可以不要再聽到這些北方的論述了嗎？



ISA的副會長正在ooVoo上編織全球社會學：最新一次的視訊會議

我在澳洲寫下了這篇文章，而且，我是一個英國殖民者的曾孫女。從原住民的觀點來看，全球化他者一直在我們之中，已經200年了。英國1788年開始佔領他們口中的澳洲，同時，在Königsberg的康德正在夢想一個和平的世界主義法則。約200年前，這個全球他者將戰火與武器帶到了拉丁美洲，100年後又征服了非洲，而且以極端暴力的方式對待這個地方(例如剛果)。

然而，在Beck的分析中，世界的歷史卻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在第二現代性中沒有永久的系統化階層，每個人都是被反身性世界化所結構。很明顯的，意思就是所有事物都環繞著世界而運轉。可是事實並非如此。

想要打破歐洲中心主義思想的方法就是去研究其他非歐洲的思想。而這正是當代社會思想的問題：那些有頭有臉的社會學家從不研究世界上其他多數人的思想。

在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中，Beck和Grant列出了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社會理論家：Bourdieu、Coleman、Foucault、Giddens、Goffman、Habermas、Luhmann、Meyer、Parsons，甚至Beck本人，然後還註明說從一個特定社會中得到的觀念被悄悄地轉變為普世的。沒錯！但是他們沒有說的是：例如Bourdieu和Coleman等人就是因為來自於世界級的大都會，所以才那麼具有影響力。一個全球的階序始終存在著，這就是最好的證明。在Beck的名單中，我們找不到Nandy、Hountondji、García Canclini、dos

Santos、Quijano、Das、el Sadaawi、Montecino、Shariati、甚至是Spivak。她/他們是全球前10大的思想家，只是不住在歐美，以及總是寫邊緣的議題。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全球的知識社會學。這個領域最好的代表是Benin的哲學家Paulin Hountondji和他的同事。殖民主義建立了一套科學分工的體制，到後殖民時代仍是如此。邊緣的國家當作是資料的採礦場，而大都會地區是理論的生產中心。在理論被生產之後，又再度輸出到邊緣國家當作是應用科學，也被當作是學生的學習包裹。Hountondji將這樣的邊緣國家知識分子姿態描述為向外的一被導向外在的權威來源。每個人從大都會學習到理論、方法，然後到大都會深造，發表大都會的期刊論文，然後加入大都會的隱形學院。各位讀者，你們在這有發現了什麼和社會學的相似之處了嗎？

對社會科學來說，對於大都會思想最有力的替代選項不是在殖民主義之前，而是在對抗殖民主義時產生的。這包括了Jamal ud-Din al-Afghani、孫逸仙、Sol Plaaaje，以及後來的Frantz Fanon和Ali Shariati。這些人是政治史上的熟悉人物，但從來不出現古典理論家的名單裡面——在他們開始批判地分析社會轉型時，或許我們就應該把他們加入到名單裡面。

在社會學之中，更新閱讀名單的時機越來越成熟了一去復原、正視、連結從殖民地和後殖民發展出來的社會思想。2010年的三本書標誌了這個時機：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or a Global Sociology、The ISA Handbook of Divers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Decolonizing European Sociology。這些著作以及其他的文章將提供我們豐富的思想泉源和素材，去編織一個真正的「世界社會學」(World Sociology)。■

（文接論「LULISMO」）

勞動市場上臨時就業現象、在通膨之外提高最低工資、對基礎建設投資的復甦、或是最近在提倡的透過借貸增加消費。他們正在「被動地同意」這些政策。

巴西的被支配階級已經疲於政治創新和在經濟上捍衛自身了。現在他們依賴著經濟成長所伴隨來的所得重分配，並且一直支持著Lulismo以及他們的新代言人：Dilma Rousseff。

但是，別忘了這次大選中有1000萬人投下廢票，另外還有2000萬人在第一輪投給了Marina Silva (綠黨)，以及數百萬人投給了極左派政黨。這些不同的聲音代表了對於巴西兩黨政治的不滿，甚至使得Dilma Rousseff勝選慶祝大會上顯得冷清且官僚。接下來就要看Lulismo在沒有Lula的年代裡會怎麼去回應這些異議了。■

(文接社會怎麼了？—來自波蘭的歷史觀點)

在ISA和PTS之前始終存在著人際與知識的連結。PTS的幾位會員先後都擔任ISA的職務，例如Jan Szczepański和Piotr Sztompka先後擔任過1970-1974年和2006-2010年的會長，Magdalena Sokołowska則是1990-1994的副會長。

在2010年之前PTS共舉辦過13次大會，主題和議題顯示出了波蘭社會(至少從1945年開始就臣服於「自然的」實驗)的變遷和公共關懷主題的變化；無論如何，對社會學家來說，在波蘭的生活是一個實存的「實驗室」(在國內外都是如此)。在這裡可以研究20和21世紀重要的社會、政治、經濟過程；定期舉辦的大會對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和公共辯論的空間而言，在發展上具有很大的助益。1970年代末，當公共辯論歷經了最批判性的一次轉向，「口述社會學」(oral sociology)這個名詞出現了，因為最重要的社會學見解只可以被討論、但是卻不能發表。

1956年之後政治解凍的頭幾年，PTS的大會反映出了波蘭社會學家的視野和胸襟：Changes in Polish Socie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New System (1965)，Sociological Theory and Research vis-à-vis Societal Practice (1969)，The Development of Polish Society and Sociology (1977)，Polish Sociology Facing the Country's Problems (1981)。

在1989年之後，大家都理所當然地打目光投注在後共產主義社會的轉型上，包括理論與經驗的各種議題。包括像是Fundamental Change and Its Challenges: Theories of Social Change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Present (1990)，或是People and Institu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der (1994)。最近幾次的大會，包括今年這次的主題則聚焦在差別化過程以及社會與社會學本身的面臨的焦慮與不確定性。例如：What Associates Us，What Differentiates Us，What's Happening to Society (社會怎麼了)?

在今年第14屆的大會中，Claus Offe以「現今所謂的政治與社會的進步代表的是什麼意思？」為題的演講上，更是充滿了上述的不確定與焦慮感。各個場次的發表、座談、特別場次等也都討論這個問題。不過會員大會和座談則是面向未來的。的確，許多的重要場次都著重在以對當代現象分析為基礎之上然後去「閱讀未來」(reading the future)。

本屆大會以Piotr Sztompka所帶領的其中一個場次討論了「全球化下的社會與社會學」以及Michael Burawoy討論的「公共社會學」作為會議的結論。這樣閉幕的討論讓我們不但瞭解、還更加積極地將社會學闡述為是一種未來導向而且是投身公共領域的一門學問。■

(文接社會學的世界主義轉向)

近期的世界史似乎正要求著大家：若要在這個新文明化的潮流下生存一邊論想要從中得到任何好處，就需要每個國家主動積極地去內化這個過程。這是為什麼我稱此一文明化過程為「反身世界化」(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而這個全球性文明化的情境，是一種反身現代性，或是第二現代性。

5. 我不認為民族國家正在消失中。我認為，民族國家只是全球權力遊戲中的一個行動者。重點是那個權力遊戲，而不是民族國家。

6. 這樣的焦點轉移需要社會科學的再結構化。這不只包括理論、概念、方法的面向，還要擴及每一個研究組織。每個批判的焦點必須放在世界上每一個新的不平等上。所有的基本概念—特別是民族國家—都要重新檢討。這些之中許多是「僵屍概念」(zombie concepts)，意即只出現過一次之後就再也不存在的概念。

7. 世界主義社會學不僅僅包括社會科學根基的重組，還包括焦點的轉移：從方法論國族主義到方法論的世界主義。這個轉向要還要轉向批判。而批判的焦點必須放在新興的不平等上。以往具焦在民族國家，使得客觀、價值中立(value-free)的社會學很可恥的臣服於民族國家的淫威之下，完全看不見世界上支配和不平等的根本轉變。

這個社會學的世界主義轉向，有風險，但也是個機會。所以，現在讓我們親吻青蛙，看看青蛙會不會變成王子一開始重新對應這個全球化時代之中新的風貌、潮流、衝突、行動、和制度。畢竟親吻並不會造成任何傷害，我說的沒錯吧？

關於世界主義社會學的爭論，請見Ulrich Beck/Edgar Grande (eds): Varieties of Second Modernity: Extra European and European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3), 2010；以及Soziale Welt 61 (3/4), 2010。■

文接達卡：絕望之城

這個400年的老城，親眼目睹了自身的興起與衰退，也見證了富庶與貧窮。17世紀末，蒙兀兒帝國(Mongul)的統治使達卡成為一省的首都；在英國統治期間，達卡沒落，加爾各達興起；但在1971年又成為孟加拉首都，因此快速成(13)長(雖然缺乏規劃)。在有能力且民主的市政府之治理下，我們期待達卡將會恢復昔日的光輝，從一個絕望的城市轉變成為一個繁榮的大都會。■